

◀（上接 10 版）

陆深说：“近观东坡诗，殊与唐人不类，余可知已，虽谓之‘宋无诗’未为不可也。”（唐锦《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伊山陆公行状》）宋诗同情者则刚好相反。贝琼“为近”之论，只否定宋季，对苏黄有所肯定，说明他在唐宋之间仍有所调和，这是黜宋派所不能认同的。他们视诗道“坏于宋”为一定不移之事实，故在唐宋之间去此取彼，无所依违。确实，没有比刘崧的“宋绝无诗”一语更能表明这种立场，他为黜宋派竖起了一面大旗。

刘崧有一定诗名，与林鸿等并为明初“以宗唐而胜”的名家（祝允明《刻沈石田诗序》），但对于整个诗坛来说，他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。如果不是叶盛记上一笔，“宋无诗”说未必能打上刘崧个人的印记。相比而言，李东阳既“以文章领袖缙绅”（《明史》本传），他对“宋无诗”说的支持，那是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了。《怀麓堂诗话》说，宋人于诗法讲得多，却“于诗无所得”，是知法而不知诗，“至于江西诗派极矣”。他抨击江西派以否定宋诗之整体，是主“宋无诗”说者的基本理路。他在《镜川先生诗集序》中还有一段议论：

汉唐及宋，代与格殊，逮乎元季，则愈杂矣。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，两汉之体已不复讲。这是诗格论的“一代有一代文学”之说。李东阳不只是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诗格，更是提出要“轶宋窥唐”，所以其所谓“代与格殊”，实以宋为节点，将诗史分作两截，宋以下呈现为退化的趋势。可知其中包含了唐宋之辨的内容。“一代有一代文学”之说开始与唐宋之辨发生交集，“宋无诗”亦成其题中之义。

当其时，诗风未振，李东阳虽唱“宋无诗”之说，尚不足以复兴唐音。直到弘治以后七子派崛起，刘崧竖起的旗帜终于飘扬于明代诗学的制高点上。李梦阳在《潜虬山人记》中说：

山人商宋梁时，犹学宋人诗。会李子客梁，谓之曰：“宋无诗。”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。已问唐所无，曰：“唐无赋哉。”问汉，曰：“无骚哉。”山人于是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。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，李子曰：“夫诗有七难：格古、调逸、气舒、句浑、音圆、思冲、情以发之，七者备而后诗昌也。然非色弗神，宋人遗兹矣，故曰无诗。”

明初苏伯衡《古诗选唐序》有“唐不汉，汉不秦，秦不战国”之论，然其主张“以世变论”，强调

世风之变所导致的各代文学的整体差异。这进入不到严羽的唐宋之辨的层面，也推不出“宋无诗”说。李梦阳则强调一种体裁在不同时代的差异性，这正是苏伯衡所反对的“以体裁论”。梦阳的所谓“七难”，实以唐以前诗体为样本归纳出来的，用作标准来看待唐宋之变，发现“宋人遗兹”，于是也就顺势带出“宋无诗”的论断。《缶音序》说“宋人主理不主调，于是唐调亦亡”，言外之意，宋代无唐调，所以无诗。这就是典型的唐诗本位观念。何景明说“近诗以盛唐为尚，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”（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）、“唐诗工词，宋诗谈理”（《汉魏诗集序》），也是强调唐宋异调，也同样可以认为含有“宋无诗”的判断。以唐为宗，必以唐为本位；以唐为本位，则越严于唐宋之辨，便越固执于“宋无诗”说。那么，与其说“宋无诗”是七子派宗唐的理由，不如说他们是从宗唐的立场出发来判定“宋无诗”的。

李梦阳论唐宋异调，接近于李东阳的“代与格殊”之说。但东阳专论诗格，以宋为诗格退化最重要的节点，所以“代与格殊”还只是部分的退化。梦阳泛论各体，以为每一代皆有其退化之一体，等于说是“一代无一代文学”。这就是彻底的退化论了。何景明《杂言》也说：

经亡而骚作，骚亡而赋作，赋亡而诗作。秦无经，汉无骚，唐无赋，宋无诗。“一代有一代文学”之说主张代有所胜，一代一体，依此逻辑，则前代之“有”必成后代之“无”，所以它可以有“有”（正题）和“无”（反题）两面来表述。元人表述其正题，因为他们强调新变，关注“有”的进化。到了七子，就转为表述反题了。退出故曰“无”，所以反题表述必然突出退化论的意义；后代既“无”，则必于前代宗其“有”，所以又突出了复古论的意义。他们的“一代无一代文学”之说实以“宋无诗”为结穴，加上“诗必盛唐”的口号，一反一正，构成其复古论诗学的基本内容。

七子将宋季以来形成的“宋无诗”、“一代有一代文学”与宗法盛唐这三种观念完全融合起来，在理论上强有力地支撑起其复古的主张。“宋无诗”说亦由此进入极盛时期，成为统治明代中叶诗坛的“意识形态”，就像王世懋在《艺圃摘余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：“今世五尺之童，才沾声律，便能薄弃晚唐，自缚初盛，有称大历以下，色便赧然。”当时大多数人固然是随波逐流，但同主此说者，未必都走同一条“诗必盛唐”的路。祝允明《祝子罪知录》卷九说：



明初刘崧始唱“宋无诗”说



李东阳对“宋无诗”说加以推动



杨慎坚持反对“宋无诗”说立场

“《三百》之后，千年诗歌，道至此而灭亡矣，故以为死。”《四库提要》以为“勦袭前人之说”，实则允明欲以由唐上溯六朝以至先秦，故称“诗死于宋”。王廷表《升庵长短句序》说：“宋人无诗而有词。”这只是为词学张目，意不在宗唐，而近于元人的“一代有一代文学”之说。赵南星《苏子哲诗序》说：“诗自古至唐而止，宋人无诗。”他是在公安派之后重提“宋无诗”说的，欲以七子救晚明诗风之弊，故又曰“献吉之后复无诗”。但他以宋诗“不可以见性情”而予以否定，是亦有取于公安派的“性灵”之说。胡纘宗《杜诗批注后序》说：“唐有诗，宋元无诗。”又

说：“不及唐，不可与言汉魏矣。不及汉魏，不可与言《风》《雅》矣。”其《唐雅序》亦谓“唐以降无诗”，主张“由唐入汉”，以追《骚》《选》。王夫之主张以魏晋风雅为桀夔，所以他在《夕堂永日绪论内编》中说：“欧阳永叔亟反杨亿、刘筠之靡丽，而矫枉已迫，还入于枉，遂使一代无诗。”“宋无诗”说固然是复古的，但从宋往后转，自不必止于盛唐，故刘崧祖述汉魏，李东阳上追两汉，而祝允明、胡纘宗、王夫之诸家也都与七子派取径不同。这可以看作是主“宋无诗”说一派的内部分歧。

三

祝允明在《祝子罪知录》卷九“诗死于宋”一条中说：

论者又或以宋可并唐，至有谓过唐者，如刘因、方回、元好问辈。后来暗陋吠声附和之徒，皆村学婴童，肆恣狂语，无足深究。另外，他在《刻沈石田诗序》中也提到“或以宋可与唐同科，至有谓过之者”，可见自黜宋之风开始流行，唐宋同科的观念便也随之而生，并且“暗陋吠声附和之徒”也还不少，略见元代两种对立观念相互抗衡的格局。

明初反“宋无诗”说者主要有黄容、瞿佑等。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二十六说：

若刘子高不取宋诗，而浦阳黄容极非之。容又并杨廉夫、高季迪而疵议之。又有钱塘瞿宗吉则为《鼓吹续音》，盖以宋金元律诗并称，至以“举世宗唐恐未公”为言。黄瞿大抵以为宋人之所长，有不减于唐者。黄容称苏黄“独宗少陵、谪仙二家之妙”，“临川、后山诸公皆杰然无让古者”，以此驳斥刘崧的“宋无诗”说（《江雨轩诗序》）。瞿佑《鼓吹续音》仿元好问《唐诗鼓吹》体例，专录宋金元三朝律诗，特见其“举世宗唐恐未公”（《题鼓吹续音后》）的立场。方回高度评价苏轼黄陈诸公，瞿佑以为“议论甚正，识见甚广”（《归田诗话》卷上“唐三体诗序”），说明方回也影响了他对宋诗的态度。

黄瞿二人在明初皆地位不显。当时声望甚高的方孝孺，以继承程朱之学为己任，极推崇“风俗淳美”的宋风（《正俗》），故于诗文也连带加以称赞。尝作《谈诗五首》，其二曰：“前宋文章配两周，盛时诗律亦无俦。今人未识昆仑派，却笑黄河是浊流。”讽刺了黜宋者不知宋。其四曰：“天历诸公制作新，力排旧习祖唐人。粗豪未脱风沙气，难诋熙丰作后尘。”肯定元人祖述唐诗，却尚不足以超越宋人。孝孺的尊宋立场不是针

对“宋无诗”说的，但对反“宋无诗”说者有一定影响。比如都穆不满于宗唐之风而雅意于宋，称方孝孺二诗“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”（《南濠诗话》卷上）。嘉靖年间，游潜撰《梦蕉诗话》批胡纘宗“宋元无诗”之论，曰：“‘无’之一字，是何视苏黄公之小也。”又引方孝孺二诗，以示其唐宋并尊之意。

杨慎是李何主盟坛坫时最重要的反“宋无诗”说者。《升庵诗话》卷十二载，何景明说“宋人诗不必观”，杨慎以张耒诗使辨之，何氏以为唐诗，杨慎笑曰：“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。”那么，杨慎的基本思路不外乎是以唐庇宋。他在《升庵诗话》中反复批判“宋无诗”说：

（文与可）其五言律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。……此八首置之开元诸公集中，殆不可别。今日宋无诗，岂其然乎！（卷一）（张南轩）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，谁谓宋无诗乎？（卷四）刘后村集中三乐府效李长吉体，……三诗皆佳，不可云宋无诗也。（卷十二）

刘原父《喜雨诗》云云。此诗无愧唐人，不可云宋无诗也。（卷十二）

杨慎一再证明宋人自有不少与唐诗风格意趣相合的作品，所以不可说“无诗”，但他并不强调宋诗的独特性。明人之同情宋诗，往往如此。符观编《宋诗正体》，欲“为宋人立赤帜”（引自《百川书志·古今书刻》），序称入选之诗“调气浑厚、意味隽永”（引自范邦卿《天一阁书目·天一阁书目碑帖》），仍属唐调，则其所谓“正体”亦可得而知。隆庆初，李蓑编《宋艺圃集》，渔洋以为“其学识有过人者”（《香祖笔记》卷三），但其宗旨所在，却是“离者离远于宋，近者近附于唐”（《书宋艺圃集后》），而以“仪唐”名其诗集，更见其尊唐之意。慎蒙编《宋诗选》，其书不可见，然王世贞《宋诗选序》称是编“非为伸宋，将善用宋”，盖指其虽有取于宋而不昧于唐宋之辨，则知慎氏之选亦必求合于唐调。以求合于唐调的趣味来主张宋有不可废之诗，非为崇宋，实为尊唐，而未始立于主“宋无诗”说者的对面，甚至不妨与之同流，如李蓑在《书宋艺圃集后》中所说：“世恒言宋无诗，厥有旨哉！”由此说来，以唐诗本位的立场去同情宋诗，远不足以消解“宋无诗”的观念。杨慎虽然立场很明确，但以唐庇宋，终使其反“宋无诗”说不能与“宋无诗”说发生真正的冲突，这一点跟诸选家并无不同。

杨慎的反“宋无诗”说之所